

民国时期江浙籍 主要社会学家记事

赵定东 郑蓉 等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江浙籍 主要社会学家记事

赵定东 郑蓉 等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记事 / 赵定东, 郑蓉等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161-1998-3

I. ①民… II. ①赵…②郑… III. ①社会学家—人物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151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特约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民国时期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的研究起源及取向·····	赵定东 郑 蓉 (1)
一 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及其思想的产生路径 ·····	(2)
二 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的学术研究特点 ·····	(13)
三 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的学术贡献及启迪 ·····	(36)
陈翰笙生平与学术记事 ·····	郑茹予 赵定东 (46)
一 陈翰笙生平记事 ·····	(46)
二 陈翰笙主要著作、文章目录 ·····	(53)
三 陈翰笙简传 ·····	(60)
四 陈翰笙主要思想观点 ·····	(74)
吴泽霖生平与学术记事 ·····	冯 舒 赵定东 (78)
一 吴泽霖生平记事 ·····	(78)
二 吴泽霖的主要著作、文章目录 ·····	(79)
三 吴泽霖简传 ·····	(83)
四 吴泽霖学术生涯 ·····	(108)
孙本文生平与学术记事 ·····	唐代吉 赵定东 (133)
一 孙本文生平记事 ·····	(133)
二 创立学术团队, 构建学术摇篮 ·····	(142)
三 致力建立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 ·····	(151)
潘光旦生平与学术记事 ·····	金林海 赵定东 (174)
一 潘光旦生平与重要著述年表 ·····	(174)
二 潘光旦主要著作、译著 ·····	(177)

三 关于潘光旦的研究著作、中文学位论文	(179)
四 潘光旦简传	(179)
五 潘光旦的社会思想	(192)
吴文藻生平与学术记事	童哲慧 郑 蓉 (201)
一 学海无涯苦作舟	(201)
二 宝剑锋从磨砺出	(208)
三 只有相思无尽处	(214)
四 秋来硕果满神州	(221)
五 蜡炬成灰泪始干	(226)
严中平生与学术记事	叶 娴 赵定东 (229)
一 严中平生平记事	(229)
二 严中平主要著作、文章目录	(232)
三 严中平简传	(235)
四 思想成就	(243)
严景耀生平与学术记事	吴 恬 郑 蓉 (246)
一 严景耀生平记事	(246)
二 严景耀个人学术成果	(248)
三 严景耀简传	(248)
四 严景耀主要思想	(262)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记事	胡梁敏 郑 蓉 (271)
一 章太炎生平事迹	(271)
二 章太炎主要著作、文章目录	(279)
三 章太炎简传	(284)
应成一生平与学术记事	魏洁如 郑 蓉 (303)
一 应成一简传	(303)
二 应成一社会学思想	(324)

陈达生平和学术记事	瓮翰清 郑 蓉 (339)
一 陈达生平记事	(339)
二 陈达的主要著作、文章	(344)
三 陈达简传	(346)
四 陈达思想观点	(353)
费孝通生平与学术记事	马路平 郑 蓉 (359)
一 费孝通生平简介	(359)
二 费孝通学术生涯	(361)
三 费孝通主要书籍	(364)
四 影响费孝通学术研究的主要因素	(366)
后记	(376)

民国时期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的 研究起源及取向

民国时期的社会学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跨越了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发展和相对成熟时期，包含了中国社会学从系统引入到逐渐契合本土文化的一个渐进过程。民国时期社会学家的诸多研究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更是在实践上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

从短短的37年社会学发展历程看，涌现出了诸如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王亚南、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和马寅初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流派；形成了诸如以梁漱溟、陶孟和、晏阳初、李景汉、吴景超、李树青、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产生了诸如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杨庆堃、许烺光、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和赵承信等人为代表的社区学派；诞生了诸如以孙本文、吴泽霖、许仕廉、陈达、言心哲、柯向峰、严景耀、杨开道、潘光旦和杨堃等为代表的学院派；还出现了一批诸如以郭沫若、吕振羽、陶希圣、李玄伯、蒙思明、李济、李安宅、瞿同祖、雷海宗、林同济、谢国桢、罗香林、傅振伦、陈东原、全汉昇、傅衣凌、严中平、严耕望、萧公权、张友渔和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学者。其中陈翰笙、吴泽霖、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严中平、严景耀、章太炎、应成一、陈达、费孝通和马寅初等是江浙籍社会学家，他们如同一颗颗耀眼的星星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史上闪烁着不朽的光芒。这些社会学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功成名就，而且还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路和视角，也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学术思想的结合，为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方向。

一 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及其思想的产生路径

刘少杰教授在其《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一书中曾指出,团结合群是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强烈的时代呼唤,是中国社会学刚刚崭露头角便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人文精神,中国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精神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为中介基础上的一种融合关系^①。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发端有两个来源,一是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一是以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学术思想,是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传统,早期社会学家在这三大西方社会理论中分别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原则,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②。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具体到江浙区域特殊性而言,我认为,区域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也是江浙区域社会学家研究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就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及其思想的产生路径分析而言,它实际上有上述三个来源。但在不同时期,这三个来源的影响力不同。

众所周知,从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整体情况看,社会学传入我国,最早是从1897年开始的。以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第2章刊布在《国闻报》为伊始,1902年章太炎翻译出版的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3年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群学肄言》)全书翻译出版,标志社会学在中国正式诞生。自此以后,社会学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至1930年代成为鼎盛期,成长起一批中国的社会学家,其中有陶孟和、陈达、许德琦、琳达、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序经、雷洁琼、李剑华、吴泽霖、吴景超、陈翰笙、林耀华、李安宅、费孝通等。193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又标志中国社会学雏形期的来临。自此随着一批具有东方特点和学术价值的中国社会学专著的问世又把中国社会

^① 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3页。

^② 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学推向了发展和相对成熟。

江浙区域的社会学发展历程同全国一样,因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每个过程中都有江浙籍的社会学家代表,而且江浙籍的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如浙江籍的章太炎翻译出版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诞生;江苏籍的吴文藻大力推进社会学人才的培养为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苏籍的孙本文大力推进教材建设和社会学平台建设,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推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苏籍的费孝通等更是将社会学的本土化上升为世界影响。民国时期社会学何以在江浙区域特别发达?这有诸多方面的根源。

1. 江浙区域地理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

江浙区域所代表的吴越文化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形成并得到发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由边缘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核心文化的历史过程,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世致用的独有品质,这种经世致用的独有文化品质与近现代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密切相关。

上古至先秦时期,由于江浙区域的吴、越等民族的融合及其政治上的统一,吴越文化作为统一的区域性文化,开始逐渐形成。宋元至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社会趋向长期的统一与稳定,特别是随着整个国家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渐趋南移,即已构成当时传统文化内核。如以当时主要代表的程朱理学来说,江浙区域所在的东南地区就是其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宋史·道学传》所载24位理学家中,籍贯东南地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及福建路的理学家就有12位,恰占总数一半。而在《元史·儒林传》所记载的45位理学家中,籍贯东南地区江浙、江西二行省的理学家多达33人,约占总数的70%以上。在《明史·儒林传》所记载的115位理学家中,籍贯东南地区南直隶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布政司的理学家更多达93人,约占总数的80%以上。在《清史稿·儒林传》所著录的286位理学家中,籍贯东南地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六省的理学家也多达222人,约占总数的77%左右^①。及至近代时期,江浙区域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

^① 易息莉:《江南地区早期近代人才优势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首先接触的主要区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与工人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并得到发展的地方，该地区的文化也最先走向近代化。

谈到江浙区域社会的传统思想特征，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其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并归之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其实，“经世致用”并不是实用至上，而是注重从实际出发，开放包容，灵活应变，开拓创新，其中蕴涵的是求真务实的精神。“经世致用”思想在江浙区域乃至放大为江南知识分子及士大夫中普遍得到深入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唐宋以降，江浙所在东南地区社会的腾飞是在开拓创新的基础上出现的，许多方面是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反拨。城市在江南社会的变革中确实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从原本高度统一和封闭、保守的统治据点，到多样、开放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和商品市场中心地，城市形态的这种转变，引发了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系列新动向^①。如在社会领域，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冲破了传统世袭性社会士、农、工、商截然区分的身份限制，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在经济领域，城市工商业的兴盛和市场活动的扩张，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越来越多呈现出商品化趋势；在文化领域，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表明社会文化重心开始由士人阶层转向社会大众；在思想领域，市民意识并不局限于重商逐利的价值观，还包括平等自主的社会观、求富裕的人生观和自由开放的生活观，这些观念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意识产生很大的区别。更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是江浙自发自生的，是地域本土化的一种推动力。是在潜意识里就有的“天人相分”因子对传统中国“安息于土地”社会价值观的扬弃^②。

所有这些变革，使江浙区域的社会思想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也深刻影响了江浙区域人们对新学科、新知识的价值取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推动力，西方新思潮涌入中国。中国思想界整体呈现出自由化、开放化、多元化的局面，这股热潮延续到二三十年代，演变为颇具规模的对文化问题和

① 陈国灿：《从南北文化互动看江南地域精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13日。

② 赵定东：《浙江精神的结构及其价值观涵量》，《观察与思考》2012年第4期。

社会问题的讨论。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所做的研究不乏学术性，但主旨是探讨中国发展道路这一价值性、现实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造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也是江浙区域思想界的主流问题。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治万人之病”的社会学被引入中国。

2. 江浙区域新式教育体制的变革特别是教会学校的直接推动

一般而言，谈论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必须要论及三个关系，即初创的中国社会学与日本的关系、初创的中国社会学与美国的关系和初创的中国社会学与苏联的关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向西方学习，取得了很大成效。于是中国很多持开放态度或受过新式教育的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纷纷东渡日本取经，一时形成潮流，1907年留学日本的已逾万人。这些对中国晚清社会感到绝望而就近探求中国新出路的留学生和政治逃亡人士，努力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如相继翻译了日本社会学著作，传入国内，最早要数前面已经提到的章太炎190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

中国社会学与美国更有着更加广泛的关系。一为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高等学校中开办的社会学系，二为退回庚子赔款，开办留美学校，设置社会调查研究机构。这两方面的措施，对中国社会学的生长起到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从1909年至1911年，中国共派出三批庚款生共计183名。1911年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正式成立，更使庚款留美制度化、规范化。仅1911年留美学生达800多人，留欧学生有400人左右。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专学社会学的，也有学其他专业的，但回国后他们大都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到建国前夕，有22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10所是教会学校，而美国教会所办的就占了8所。它们是：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大学、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前4所早于20年代就设立了社会学系。

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初创也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大钊1920年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一文中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在李大钊的心目中，研究“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

会学。他在1920年八卷四号的《新青年》上撰文《唯物史观与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说：“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1922年，共产党人瞿秋白又到上海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他所讲的社会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争的事实。据孙本文1947年12月调查统计，在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工作或任教的，大部分都曾留学。各大学任教的社会学主讲教师共144人，其中有10人是美国教师，其余134位教师中有107位曾是留学生，即是说，在中国籍的教师中，有79.85%都是留学生。在留过学的教师中，有10人是留日的，而留学欧美的占90.65%^①。江浙沿海独具区位优势，西方文化得以趁地理位置之便首先涌向此处，使江浙学人得以受到熏陶，留学意识自然更为强烈^②。据清华大学历年毕业生统计表，1909年到1929年20年间，清华留学美国的生源中，江苏、广东、浙江三省分别为274、185、157人，高居三甲，其他省份均未达到三位数^③。前述的陈翰笙、吴泽霖、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严中平、严景耀、章太炎、应成一、陈达、费孝通和马寅初等江浙籍社会学家也大多或曾经求学于教会学校，或直接留学于国外。如陈翰笙曾广泛游学于欧美俄、吴泽霖在清华学堂毕业后直接留学于美国、孙本文受章太炎的学生康宝忠影响开始接触社会学后留学于美国、潘光旦留学于美国、吴文藻留学于美国、严中平也曾游学于英国、严景耀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游学于苏联、法国、英国、章太炎更是直接接受了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应成一留学于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师从著名的社会学家E. A. 罗斯攻读社会学、陈达19岁时在杭州考上留美预备班后留学于美国、费孝通留学于英国。

为何江浙籍的知识分子在晚清及民国时期迷恋于留学国外呢？这与本区域的开放性教育体制改革有很大关联。

易息莉在分析江南地区早期近代人才的来源时，曾指出，主要有两个

① 转引自刘洪英《留学生与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② 王东芳：《民国时期留美大学教师特点解析》，《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渠道：一是通过新式教育培养；二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传统人才转变而来^①。

新式教育培养人才与清政府在教育领域进行的较大改革有关。当时清政府制定学制、废除科举、设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为了学习西方，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兴办开始，各地新式学堂日益增加，1898年维新变法中的光绪帝发布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②

但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书院改学堂的计划也随之破产，然而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已是大势所趋。20世纪初，教育救国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张之洞、刘坤一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指出：“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覆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③为此，必须将书院改为学堂，“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④。

张之洞、刘坤一还提出了改学堂的办法：在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省城设高等学校，高等学校毕业后，送入京师大学校，并详细规定了各学校的入学年龄、学习科目、学习年限、主管机关及学生毕业的身份授予等一系列制度，并参酌东西学制，将学科分为七大门类即经学、格致学、兵学、农学、政治学、史学、工学。这样，在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就提出了完整的学制系统。清政府接受建议，于1901年9月下令将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⑤清政府于1902年1月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

① 易息莉：《江南地区早期近代人才优势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② 《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④ 同上。

⑤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议，随时具奏。”^①这样，张百熙就担负起制定一个全国学制系统的任务。1902年8月张百熙上呈其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臣此次所拟章程，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并《考选入学章程》，暨颁发各省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各一份。又蒙养学堂为小学始基，前奉谕旨令各省举办，谨再拟《蒙学堂章程》一份，共六件，一并开呈御览，恭候钦定颁行。”^②是为《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详细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从纵向看，该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三级：蒙养学堂、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又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从横向上看，在普通教育系统外，还附属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旁系。《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正式公布的第一个学制，但由于不够完善及清廷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不久即重订，被张之洞所订的《癸卯学制》取代。近代以来，张之洞对教育关注较早，从1895年提出兴办新式学堂开始到1904年制定癸卯学制的10年间，他一直结合自己的办学实践研究中国学制问题。1904年1月，张之洞进呈《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从《近代教育史资料》看，《奏定学堂章程》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等22个文件，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学制系统。该学制在纵向上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中分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中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通儒院三级；在横向上，与《壬寅学制》不同的是：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已从普通教育中独立了出来，并与普通教育一样有详细的章程可循。

《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近代学制系统正式建立，使我国的教育从古典向近代转型，并奠定了教育现代化的基础^③。

在清政府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江浙区域更是与本地的区域优

① 《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③ 刘绍军：《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势结合起来,形成了开放式的教育模式,进而在本区域形成了开放性的求知心态。

如江苏常州今文学派致力于为现实服务的“经世致用”思想急速涌动,江苏出现了一大批既学习经史又旁及实用之学的新式书院。当洋务运动兴起之时,长期在苏州、江宁等地书院执教的冯桂芬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变革思想,提出了改革科举,设立学堂等教育主张。随着江苏巡抚李鸿章设立上海广方言馆,以洋务学堂为主的江苏新式教育次第开办,南洋公学、金陵同文电学馆、江南水师学堂和爱国女校等一批新式学堂成立。尽管这一时期江苏境内的新式学堂寥寥可数,但它们为江苏教育的变迁与演进确立了近代化的指向:中西结合、经世致用^①。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诸如徐家汇公学、南京汇文书院、镇江女塾等都采用了近代西方完整的学校制度,影响和推动着江苏教育的中西结合之路,江苏教育向近代化转型。从1904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应聘到江苏任学堂教习和顾问的达183人,当然也有仪型欧美、聘请西洋教习的新学堂。至此,江苏教育从体制改革、学校形式到课程内容、价值取向,都迅速表现出离异传统教育的趋向,近代化格局初步形成。

1914年,在华基督教教会学校共有1.2万余所,学生总数为25万名,而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有57267所,学生总数163万,与教会学校的数量比是5:1,学生数量比是6:1。但就新式教育来说,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政府办新式学堂,江浙在全国都不是首发的地区,如宁波崇信义塾开办于1845年,远晚于1839年建于澳门的马礼逊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开办于1864年,亦迟于北京的同文馆,尽管如此,但后来上海广方言馆成为同时期三个同类学校(外有京师同文馆、广州广方言馆)中成就最显著的一所,1868年建立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中参与译书的华人知识分子,有籍贯可考者48人,其中江浙籍者40人。

至于教会学校在江浙地区的发展相对于全国则更令人瞩目,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江浙的教会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批有影响的中学相继开办。如上海圣约翰书院(1879)、中西书院(1882),苏州博习书

^① 束鹏芳:《近代江苏教育对“苏派教育”的映照和馈赠》,《江苏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

院(1884)、杭州育英书院(1888),这些学校分别是后来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之江的前身。20世纪20年代全国发展较快的教会大学有金陵、燕京、沪江、东吴、圣约翰五所,江南占了四所。就浙江的情况来看,1915年,在75个县中35个县有教会学校,共148所,学生人数6328人。到1923年,浙江75个县中有42个县有教会学校,共219所。据1951年的统计,全省教会学校中,浙北地区有51所,占全省一半以上^①。这些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以之江大学为例,1934年有学生438人,1941年有学生1000人,先后培养的学生数以万计。从上看出,教会学校在当时是一支重要的教育力量,如果没有教会学校,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也许会失学,尤其是一部分贫寒学子就会失去就学的机会。特别在办学初期,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青少年入学,条件非常宽松优惠,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和学习用品,个别学校甚至还发给一些津贴补贴家用。后来,教会学校虽然普遍收费了,但大都实行工读制,贫寒子弟可以通过勤工助学完成学业。如嘉兴秀州中学受惠于工读制的学生最多的一个学期有110人,占总数的50%以上^②。这样就使得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贫寒子弟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另外,教会学校以平等的姿态吸收女孩就学,这就为一部分女子创造了受教育的机会。

同时西方传教士来到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所寻求的传教助手、中文教师、中文翻译等,又间接推动了江浙区域外来文化与本土人才的融合。如19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主持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就已经聚集着一个本土知识分子小群体,这些本土知识分子初涉墨海书馆接触西学时已经是成年者,或已在传统文化中接受了完整的训练,或已在某一传统文化领域中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名噪一方,他们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西学并参与西学传播活动。

3. 江浙区域地方政府和士绅的引导

与全国其他区域不一样,江浙区域地方政府、士绅和学生家庭对教会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首先是地方政府投以友好的合作。如中西书院初建时的两所分校的应用书籍、器具等是由李鸿章等清政府显宦和华人富商捐款所置办,建筑大书院的校舍时又另在中国官绅富商中募大洋

① 《浙江教育简史》编写组:《浙江教育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韩慧莉:《略论浙北教会学校的作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400元，在1882年办学经费的募集中，上海道刘瑞芬捐100元，上海知县莫祥芝捐100元，江南制造局捐100元，广方言馆总教习舒高第捐100元^①。除了上海由于租界的条件教会学校较顺利地发展外，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发展良好。如苏州的博习书院自1876年后就因为学生增加而几度扩大校址，到19世纪末扩建为东吴大学时更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的赞许。1876年6月，格致书院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正式开学，1889年，在春季特课中，李鸿章让学生叙述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很多青年学生从亚里士多德、培根到达尔文、斯宾塞，不仅能叙其生平、述其业绩，而且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对西方科学的发展脉络有着较深的理解和领悟。

江浙区域社会在对教会学校的态度上表现出开明性、开放性，在政府办的新式学堂中同样有反映。甲午战争之前江南地区新学堂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在这些学堂中广方言馆办得最早，也最有影响，该校主管者的办馆意识相对开放，经办认真直接联系。广方言馆创办时由李鸿章、冯桂芬制定的章程中，教学上虽称中西学并重，但西学予以明确强调，每月初一、十五两次课试西学，规定对西文茫无通晓者即行撤换。据林乐知的记载，担任该校监督的上海道应宝时在规定外每周日测试班上英语程度好的学生，让学生将来自美、英两国领事馆的简单的信函译成英文。该校1870年制定的新章程中，要求对广方言馆的优秀学生“赏给举人”头衔，允许“一体会试”^②。

江浙区域地方政府和士绅对利用代表现代科学的西学创办自己的新式学堂方面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如在开办学堂的过程当中聘用了一批通晓西方学术科学的知识分子，担任西学课程的讲授。在共同的民族危机所激发的“救亡图存”的初步民族意识影响下，他们身在江湖，心忧天下，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共同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感，使他们在晚清“变法图强”这面旗帜下聚集起来，向当权者发出“大变”、“快变”、“全变”的政治呐喊，表明了知识分子的地方影响力日益扩大。

① 易息莉：《江南地区早期近代人才优势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